

# 倦飞知还：从“归鸟”意象看陶渊明仕宦时期的仕隐矛盾与抉择

包昱

香港浸会大学

**摘要：**陶渊明以飞鸟归回田园写出了自己逐渐确立隐逸之志的历程。在魏晋诗人书写飞鸟意象的传统之中，一方面继承了建安正始比兴言志的传统，以飞鸟寻求归宿象征追求自由与理想，和建安正始精神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将归鸟意象与自身经历相结合，从而超越曹植阮籍等人笔下的飞鸟形象：陶在对飞鸟之归的书写之中找到了一种新的生存状态：面对魏晋祸乱的政治格局，陶以飞鸟之归于山林象征寻找到生命的安顿。

**关键词：**陶渊明仕宦；归鸟意象；仕隐矛盾与抉择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2.02.128

## 引言

陶渊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明确意识书写个人由官场隐退田园身心历程的诗人，自钟嵘《诗品》称陶渊明确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历代正史名传反复刻画一位毫无出处矛盾、正典化的隐逸形象，“而陶渊明的诗文，又被均质化（homogenize），为作者始终不愿向乱世政治及利禄功名妥协之例证。”实际上，陶渊明并非从一开始面对仕与隐的抉择时就表现的非常坚定。在陶渊明的诗文里，诗人反复思考“归隐”这一人生选择，其心境并非始终如一的冲淡超越而是一直处于矛盾复杂之中。其诗歌中反复书写的“归鸟”意象，即是他数次强调自己归隐之志的例证。

据《归去来兮辞》序言中写到：“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是他选择出仕的主要原因，但实际上陶渊明选择出仕的动机远不止此。如袁行霈在《陶渊明研究》一书《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节中就指出：陶渊明出仕的近十年正是晋末政局最动荡的时期，陶渊明置身政治风云的漩涡并非偶然。如其回忆少年时代的“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一句，“六经”与其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观念相关。陶早年选择出仕或还有立善、求名以达不朽的愿望。

陶渊明于近三十岁起任江州祭酒，至辞彭泽县令终不再仕之间有近十年的时间，这期间先后出仕桓玄、刘裕、刘敬宣等人，历任州祭酒、桓玄入幕、镇军参军、建威参军、彭泽县令，经历了解归、辞辟、丁忧等等转折。从几次出仕与辗转来看，陶渊明是经历了几番思想斗争才最终决定终不出仕的。

回归田园之后，再次面对家里贫困的局面，以及经历晋宋易代的政治变换，陶渊明却选择了不再出仕。齐益寿在《陶渊明的政治立场与政治理想》一文中认为，陶渊明在亡国之后逝世之前这八年与此前的心理与思想发生了的变化，陶从单纯的政治立场突破到深刻的政

治理想。亡国的经验使得陶认识到三代以下起家的统治者均不是他理想的君主模式，因而提出“桃花源”这一“无君臣”的政治理想模式。但陶渊明自己也深知这一模式最终无法实现，为了坚守自己的理想，他将田园作为自己最终的归宿。本文延续这一看法，认为这个时期陶渊明的思想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是出于对仕宦时期经历了政治的混乱与可怕希望避祸全身，另一方面，也是“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本性延续，希望洁身自好坚守君子“固穷守节”之志。

同时，陶渊明直陈时事的作品并不多，从这些诗文直接探讨其仕隐矛盾与抉择难度较大。陶对于隐逸理想的表达多集中于对历代隐士的歌颂和几个集中意象的塑造（如菊花、孤松、归鸟等），“飞鸟在日夕之时归山，是陶渊明诗中常常写到的景色。”而“意境和景物的人格化，是陶诗的鲜明特色之一。”“归鸟”可以看作是陶渊明自我塑造隐逸人格的一个重要意象。归鸟从最初的展翅高飞，至徘徊与倦飞再到回归田园，正与陶渊明仕宦时期的思想经历相似。其四言诗《归鸟》可以作为理解陶诗“归鸟”意象的总纲：“飞鸟以远游八表到怀其旧栖、倦飞知还至归林不出的过程，造语变化微妙，实际是以归鸟比喻自己由仕而隐的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以“归鸟”为核心，陶渊明创作的内在思想逻辑与其之间有紧密的关联，从诗人对“归鸟”的反复书写，可以梳理其在仕宦时期的思想矛盾与归隐之后的抉择。

本文试图从“归鸟”这一特定意象入手，探讨陶渊明在仕宦时期的矛盾心态和复归田园的身心历程，从“归鸟”意象的书写看陶渊明隐逸人格自我塑像的过程。

## 一、“飞鸟”意象：魏晋诗人的书写传统

在诗歌史上，“飞鸟”意象一直是诗人笔下钟爱的选择。《诗经》中多有以“飞鸟”起兴的篇章，但此时

的以鸟起兴多是自由联想，与诗人实际经历之间的联系尚不紧密。至汉末，飞鸟意象逐渐成为诗人所吟咏的共同题材之一。东汉至魏晋诗歌中的“飞鸟”意象从《诗经》中禽鸟比兴发展而来，此时“飞鸟”意象多以寻求归宿、寻找知音象征自己对理想归宿的追求。同时，“飞鸟”不单是诗歌起兴的对象，逐渐与诗人们的人生经历紧密结合。

东汉末年，曹操以“绕树三匝，终有可依”的飞鸟形象将鸟之高飞与依托树木象征贤才择主而事，代表曹操求贤若渴、完成功业的理想。此后的诗人从他这里汲取了飞鸟形象中的象征涵义，用以依托诗人政治上的际遇与理想自由的追寻。曹植诗文中明确出现了以飞鸟意象表达自己政治理想与悲惨际遇的书写方式，出现能够代表其政治与人生处境的孤鸟网罗等意象。另一用飞鸟意象表达自己人生处境的诗人为阮籍。相比于曹植，阮籍诗歌中的飞鸟形象用来表达在当时险恶环境下知识分子的一种生存方式，脱离网罗成为飞鸟寻求自由的象征。阮诗中飞鸟的状态代表着他对当时政治形态的“忧祸”情绪，诗中频频出现“悲鸟”“寒鸟”的意象，用来寄托他在政治霍乱下求得自保的精神痛苦以及洁身独立的傲志。此外，阮籍与嵇康等诗人进一步拓展飞鸟意象之内涵：用飞鸟之“飞”表示寻觅知音。如阮籍《咏怀诗》其十二：“愿为双飞鸟，比翼共翱翔”，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其十二：“轻车迅迈，息彼长林。春木载荣，布叶垂阴。习习谷风，吹我素琴。皎皎黄鸟，顾畴弄音。感寤驰情，思我所钦。心之忧矣，永啸长吟。”这种飞翔已与建安时期追求政治理想的高昂不同，变为一种更加追求独立、追求自由的象征。他们希望寻找志同道合之人，离开与伪善的世俗之士相周旋的生活，从而追求精神的独立。

以上飞鸟意象的特征均为陶渊明所继承与发展，并且与其独特的人生经历相结合。但陶诗中的飞鸟意象有一独特之处：诗歌中反复出现飞鸟“归还”的特征，并且飞鸟之“归”与自己的思想形迹相符合。飞鸟作为魏晋诗歌传统的比兴形象，到陶的手中已经呈现出人格化的特征，归鸟一定程度上即是他本人的代表。

## 二、从“远游八表”到“怀其旧栖”

从陶诗中飞鸟意象书写可以看出他逐渐回归田园的过程：从官场到田园，陶渊明在不断流露着对家园的眷恋与渴求，对自由生活的深情向往。

学界关于陶渊明的年岁众说纷纭，但根据他诗文中的若干细节以及历代学者对其传记年谱的反复考证可以看出，陶在三十岁以前没有作品或者只有极少作品存世。因此，“我们构拟少年的渊明，只能从他后来的回忆。”陶早年常常用鸟类托兴，寄少年之志，展翅高飞

的鸟可以看作是他的自比。如《杂诗》其五回忆自己少年时代的诗篇写到：“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其笔下的鸟类为雄伟之象，诗中以任意而高飞的鸟承载着诗人的高远志趣、用世之心和功业追求。又如《归鸟》的首篇写自己早年远游八荒的志向：“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清晨离巢出林、遨游辽阔天空的鸟儿正如刚刚踏上仕途满怀理想的陶渊明。

这种展翅高飞的飞鸟形象只出现在陶渊明早年或追忆早年志向的作品之中。从他29岁离开田园生活到江州去做祭酒开始，近十年的宦游生活之中，陶诗中彷徨与徘徊、想要归还田园的心绪明显增加。飞翔之高鸟成为陶羡慕的对象，而回归之鸟成为常常书写的对象。

典型的从归鸟意象集中体现陶渊明仕隐矛盾的为《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杂诗二十首》其九至其十一几篇，据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考证，以上三首诗作于公元404—406年。与陶渊明辞去彭泽县令的时间接近，这段时间是陶渊明面对仕与隐的选择思想最为挣扎的一个时期。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写到：

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衢。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

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其中“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两句：“言鱼鸟无樊笼之苦，而自己落在尘网。”陶渊明在混乱的时局中显得隔膜，每每看到朝政的败坏与官场的污浊就会懊悔自己离开田园。因此常常会感到“为形迹所拘，即心为形役”。“‘望云惭高鸟’是陶渊明在‘心为形役’的岁月中常发的感慨。”在《杂诗二十首》其九中也表现出同样的思想：“遥遥从羈役，一心处两端。……慷慨思南归，路遐无由缘。”远离家乡，羁旅为吏，心被分割为家乡和仕宦两端，在仕与隐的选择中不断徘徊，这不得不让他常常回忆田园生活的安然自适。在《杂诗二十首》其十一中，他分别写春燕、边雁、离鹑三种鸟类均有归宿而自己却春夜无眠，忧愁有难言之隐：

我行未云远，回顾惨风凉。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

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离鹑鸣清池，涉暑经秋

霜。

愁人难为辞，遥遥春夜长。

陶渊明在桓玄幕、为镇军参军、建威参军时，仍有“时来苟冥会，宛讐憩通衢”的理想，但是衔命行役，东游西走的生活常常让陶渊明觉得“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因此作为徘徊的飞鸟，已经想要寻找一处安心之所。从“远游八表”到“怀其旧栖”是陶渊明选择归隐的第一步。

从陶渊明追随桓玄与刘裕再到辞去彭泽县令，选择归隐的原因有许多，既有及时隐退保身的考虑，也有理想破灭的因素，但情感力量的召唤是陶渊明决意辞官的直接动因。陶诗中的飞鸟也延续了曹植用飞鸟之“归”表达渴望返回故都与亲人团聚的手法，飞鸟回归旧林，即是回到原来憩息的地方。在乱世中，保有至亲的家人是陶心中莫大的祈愿，这一点从他对其血亲的眷顾从行役的作品中就能够看出。如《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中言：“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以及后来的《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等均能看出亲族伦理的安顿在陶渊明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即使他不再愿远游行役，但为了维持家中生计他选择距离家不过百里的彭泽为官。但不久程氏妹之死，“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成为陶选择辞去官职的直接原因。

实际上，陶在撰写宦游的作品里会常出现关于归田的记忆书写。“一方面不脱普遍怀旧的色调与语言，另一方面又被更深地赋予了返本复初之意。”回归田园即是自由生活的开始。在陶诗的语境中，田园与复返自然的体验是融合在一起的。在他的预设中出仕只是短暂的行为，最终的指向仍然是复归本性回归田园。亲情的召唤只是最为表层的原因，陶对自己的复归有更深层的思考。

### 三、从“倦飞知还”至“归林不出”

作为归隐宣言书的《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写出自己远离官场的缘由：“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从鸟之倦飞至“归林不出”，是陶选择归隐的最终落脚点。陶以飞鸟脱离尘网，归林不出表宣告自己的归隐之志：复归自然，重获自由。

作于辞去彭泽县令时间最为相近的《归鸟》，《归园田居五首》可以看作归鸟恋其旧林、倦其飞翔而宣告回归田园的代表。《归鸟》其四写到：“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已卷安劳！”“以鸟之脱缴，比喻人之脱封建网罗。”相同的表述在《归园田居》其一中也有写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

去三十年，羈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诗人本是热爱自然山林之人，不料误入官场的牢笼，陶以静态之“羈”“池”形容动态之“鱼”“鸟”，表现其受困于官场的现状，彷徨无助的“羈鸟”回归山林，就如诗人摆脱困扰重获自由之身。

陶渊明彻底选择归隐的深层原因在于他对于隐逸本身的思考：保持人格独立。正如钱志熙写到：“陶渊明后来的辞官归隐，是多方面因素结合作用的结果，但又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为了保持人格之完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面对“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社会局面，“士人处在以君臣关系为主轴的社会政治，不但有忧生之嗟，也会面临扭曲失真的危机。”陶对此有自己的判断与选择。

首先，陶渊明在缅怀古人，与历史人物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建构自己的隐逸人格，呈现出仕隐抉择的思辨过程，表达自己对隐逸独特的理解和坚持。在《咏二疏》《咏三良》《咏贫士》等一系列咏史诗作中，陶渊明通过不断地与前代人对话，在与历史多元交涉的过程中深层理解自己的隐逸处境，从君臣关系的判断中定位自己的隐逸价值。其中，《咏贫士》七首可以看作是其论证隐逸的道德修养，形成隐逸人格的完整论述。第一首咏孤云与孤鸟，作为古今贫士的隐喻，统摄全组诗作：

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暖暖空中灭，何时见余晖。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

这首用众鸟纷飞与孤鸟归还对比，表明自己安贫守志、不慕名利的情怀。

可见，陶渊明在反思隐士的道德操守时是以“固穷守节”为核心的。这与东晋时期但求自适，不守清贫的隐逸划清了界线。陶不满东晋时期仕与隐日渐混淆的局面，认为隐逸者安贫乐道、固穷守节是面对荣禄得以真正获得自由的基础。

其次，陶以书写失群之鸟的孤独表明其对与寒素身份的认同，写出归鸟之归的社会原因。对他而言，保持人格的独立是隐逸的关键，这是“飞鸟”失群的深层原因。

魏晋时代极重门第，而陶渊明始终与士族社会保持着疏远的距离，这与“作为一位家族地位始终未曾上升到文化士族地位的寒素士人的实际心理”有关。在他的自述中曾明确道出自己的寒素身份，其于《自祭文》中道“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箠瓢屡罄，絺绤冬陈。”他曾数次在《与子俨等疏》《归去来兮辞》《与殷晋安别》等作中自述“贫贱”。同时“渊明的文学，具有浓

厚的寒素抒情的色彩。”如其《饮酒二十首》其四写到：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其中“失群鸟”可以看作是陶渊明用以表现孤贞的寒素情怀。诗人以遭遇“失群”“日暮独飞”表现出来深度的孤独情绪，正是门阀社会寒素人士真实的心理体验。

从飞鸟到寻找到“孤生松”这一归宿，也是正如陶遭遇门阀士族排斥之后，树立“千载不相违”的志愿，寻找“托身已得所”的过程。

最后，陶渊明以归鸟为核心意象展开如何获得任真自得人生的思索。通过归鸟意象的不断书写体现出他身体力行追求的隐逸：在生命历程中建立在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因此，在《停云》一首中用：“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来表明自己的态度：面对“霏霏停云，蒙蒙时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的时局，他只希望能够与亲友“安得促席，说彼平生。”“翩翩飞鸟，息我庭柯”当中的庭柯，与《归去来兮辞》中“眄庭柯以怡颜”中的“庭柯”一致，皆为陶渊明理想的安居归隐之所。在《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五中直接用：“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之句表达出归鸟有托而自身有归的宣言。

田园是陶渊明为飞鸟寻找的憩息之所，也是寄托自己理想的精神家园。他在《饮酒》其五中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离开虚伪污浊的官场，以躬耕田园的方式实践回归自然的理想，以此保持人格的独立是陶隐逸的真正内涵。陶渊明归隐之后在山川自然中体会到了人生的乐趣，在精神世界和自然景色物我合一的无限喜悦中悟出了返璞归真的人生哲理，其欣喜与自适不言而喻。

### 结语

陶渊明的归隐矛盾在“有志获聘”与“质性自然”之间徘徊，但最终他选择了不违背本性，保持人格独立。陶以飞鸟之归复返自然写出了他在仕与隐之间徘徊，从矛盾走向和谐的过程。且相较于曹植、阮籍对“孤独”与“寂寞”的深度沉思，陶渊明的诗体现出一种傲然自适、欣然自得的理想精神状态。

### 参考文献

[1] [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

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

[2] [三国魏]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3] [三国魏]嵇康著，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4] [三国魏]阮籍著，陈伯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5] [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6] [梁]刘勰著，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7]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8] [三国魏]曹操著，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曹操集》。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9]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67-91，211。

[10]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50。

[11] 葛晓音：《八代诗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页145。

[12] 葛晓音：《山水有清音—古代山水田园诗鉴赏要》。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年，页13。

[13] 钱志熙：《陶渊明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105-145。

[14] 钱志熙：《陶渊明经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页51。

[15] 萧望卿：《陶渊明批评》。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年，页19。

[16] 叶常泓：〈「前隐逸」与「后仕宦」的视野递换：陶渊明宦游主题中出处记忆的造现〉，《中央大学人文学报》，第四十九期（2012年），页131，158。

[17] 蔡瑜：〈试论陶渊明隐逸的伦理世界〉，《汉学研究》，第24卷第1期（2006年），页131。

[18] 蔡瑜：〈陶渊明的吾庐意识与园田世界〉，《中国文哲研究期刊》，第三十八期（2011年），页14。

[19] 齐益寿：〈陶渊明的政治立场与政治理想〉，《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二十五期（1969年），页1-15，88-90。

[20] 钱志熙：〈魏晋诗歌中的飞翔形象〉，《文学遗产》第五期（1989年），页39。

[21] 钱志熙：〈矛盾与和谐，陶渊明诗歌中的一种关系〉，《求索》第一期（1900年），页91。